

# 马哈蒂尔和穆塞韦尼的 治国之策比较

——基于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的视角

□ 卞克文

[摘要] 亚洲国家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和非洲国家的穆塞韦尼都采用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治国理政。马哈蒂尔是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的亚洲类型,而穆塞韦尼则是比较典型的非洲类型。两位领导人在运用这种模式治理国家时,既有共性,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通过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艰巨任务的一种比较合适的选择。

[关键词] 治国之策;国家引导的发展;马来西亚;马哈蒂尔;乌干达;穆塞韦尼

[中图分类号] D5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1)03-0156-05

## A Comparison of the Ruling Policies between Mahathir and Museveni

BIAN Ke-we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Asian nation Malaysia's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and African country Uganda's President Yoweri Museveni both adopted the pattern of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to manage state affairs. Mr Mahathir represented an Asian type of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while Mr Museveni represented an African type. These two leaders have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mselves. By comparing them,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attern is a good choice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are faced with the arduous task of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uling policies;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Malaysia; Mahathir; Uganda; Museveni

在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引导的发展模式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政府总是力图控制国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尽可能的组织和动员全体国民支持其现代化的政策,在实践中则会不遗余力的推行政府引导的强国战略。美国学者阿图尔·科利称此类发展型的国家为“凝聚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能够创造有目的的权力并用其达到经过严密定义的国家目标”。<sup>[1](P446)</sup>马哈蒂尔领导下的马来西亚和穆塞韦尼领导下的乌干达,根据各自国家的实际都采取了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但两人在各自国家的治国之策的表现却有所不同。

### 一、国家引导的发展——马哈蒂尔 与穆塞韦尼的共同选择

“虽然人类社会存在共同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以及统一的衡量经济社会先进或落后的标准,但却不存在共同适用的统一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现有发展条件和环境不同,决定了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不同。”<sup>[2](P6)</sup>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究竟采取什么模式和道路才能完成现代化的艰巨任务,是发展的首要前提。笔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的探索中,国家引导的现代

化的发展模式是比较可行的选择。

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 1981 年成为马来西亚第四任总理,2003 年急流勇退,执政时间长达 22 年,是东亚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在马哈蒂尔时代,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电子、电机、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等行业比较发达,1997 年马来西亚在世界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 21 位,马来西亚成为名副其实的东亚之虎。

非洲国家乌干达的现任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从 1986 年上台后,实行比较务实的政策,走出了一条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快速、社会相对和谐的道路,“他依据本国的条件建立独特的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并卓有成效。”“近二十年来,乌干达经济连续保持较高的增长……1987 年至 2003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6.1%,位居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首,被世界银行列为实施结构调整计划的样板,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sup>[3](P354,364)</sup>

马哈蒂尔和穆塞韦尼的治国之策,有很多相似之处,最根本的都是选择了以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的治国之策推动各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他们采取的这种模式,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各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条件的使然。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马来西亚和乌干达都有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政治文化传统。

在独立之初,马来人的一小部分精英就通过巫统控制着国家大权。1969 年“五·一三事件”<sup>1</sup>后,“巫统的确加强了自己自由行事的权力,使它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推行各项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马来西亚的政府已经更深地卷入了经济发展事务之中,政府不仅是制定经济计划,而且直接插手金融和组织生产的业务……巫统对经济事务的控制越来越强”。<sup>[4](P161-164)</sup>马来西亚在马哈蒂尔执政的二十多年,国家对经济发展道路的干预超过前任几位总理。马来西亚能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与他的这种治国之策分不开的,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在乌干达现代历史上,独立后,奥博特和阿明两任政府基本上属于政治或军事强人型的独裁政体。奥博特执政前期,他采取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国家对经济的发展有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只是在其后期才逐渐放松了对经济发展的国家干预。其后的,小学还没毕业的阿明总统,更加无视经济规律,而根据其想像对乌干达的经济发展任意发挥,结果使得乌干达经济发展出现极大的倒退。1986 年穆塞韦尼成为总统后,在经济政策上比较务实,但总体上依然实行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其次,马、乌两国形成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是与它们的经济基础密不可分。

一般地,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经济基础。两国的经济基础的相对薄弱,在这样的土壤上无疑很难实行西方方式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多这样的社会里(指

发展中国家),教育和收入都很低,大多数人还在为生存而奋斗。领导层经常感到政治和经济的存续和发展有赖于坚强的领导人,他们按其所认为的真正需要行事,而不是直接根据大众的需求。”<sup>[5](P77)</sup>而美国学者阿图尔·科利也认为:“增长趋向的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精心设计、持续、全面实施的国家干预来发展贸易和工业,从而实现国家对高速增长追求。”<sup>[1](P15)</sup>

马来西亚和乌干达同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客观上需要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引导。马哈蒂尔执政初期,马国内恰逢经济衰退,甚至在 1985 年,马来西亚的经济出现了独立以来的首次 1% 的负增长。巫统内部争权夺利日益激化,国内的民族矛盾,特别是马来人和华人尖锐对立,反对派也乘机挑战马哈蒂尔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马哈蒂尔继承了前任,并大大强化他的权威。而乌干达的现代化条件比马来西亚更差,乌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独立后由于长期的政治动荡和战争破坏,经济一度濒临崩溃。全国运动执政时期经济是负增长,外汇储备负 2.54 亿美元,通货膨胀高达 240%。”<sup>[3](P363)</sup>穆塞韦尼针对国内形势,坚决稳定政局,调整经济,促进国内的民族和谐,开始了他的现代化的治国探索。

## 二、马哈蒂尔与穆塞韦尼的治国之策的比较

马来西亚和乌干达两国有着近似的政治体系和经济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模式也有很多的相近之处。虽然同是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马哈蒂尔和穆塞韦尼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表现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1. 马哈蒂尔与穆塞韦尼的治国之策在政治方面的比较

“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高投资率和投资的有效配置成功地促进了快速工业化,而且比其他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得都好,主要原因是它们能够通过非常有目的的手段动员、集中和利用权力。”<sup>[1](P456)</sup>马哈蒂尔和穆塞韦尼的治国之策在政治方面的相同表现:都是适度集权,规范政党制度,维护政局稳定。两位领导人都采取了民主形式,但却拥有集权的实质。

马哈蒂尔在国内赢得了“马来西亚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政治家”,“自独立以来第一个像宰相的宰相”等美誉,极受国民的爱戴。马哈蒂尔在卸任时,其个人威望和国内对他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他的个人魅力还在于他对西方的指手划脚置之不理,强硬的顶住西方的压力,并且常在国际舞台上公开批评西方,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马哈蒂尔治国之策的典型特征就是利用执政党的强大力量,结合自

<sup>1</sup> 1969 年 5 月 13 日,因大选对华人有利,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华人发生大规模的械斗,导致一次大骚乱。这次事件伤亡数百人,绝大部分是华人。这次事件后,马来西亚放弃民主体制,治国之策的倾向大大增强。

己的个人威望,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马哈蒂尔尤其强调政权建设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在他执政期间,进一步巩固了巫统在执政的国民阵线的主导地位;他推行专家治国理念,培养巫统内部的精英,对党内的反对派则坚决清除。马哈蒂尔还用法律的形式限制反对党,确保国民阵线的执政地位。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根据《国家安全法》等法律,规定政府不经审讯就可逮捕或拘留政府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政治犯。政府还对传媒严格控制,坚决杜绝对政府不利的舆论。

与马哈蒂尔类似,乌干达现任总统穆塞韦尼也是位强人,他力挽狂澜,把整个进入泥淖的乌干达挽救出来,使中断的乌干达的现代化进程得以延续。穆塞韦尼在国内实行“团结政治”,吸纳各方面的人士进入政府,政府还实行民族和宗教和解的政策,促进了国内的政治稳定。“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执政四年来,新政权已着手整治全国。目前,抵运政府虽面临不少问题,但其治国方针已取得的进展也是有目共睹的,政局基本稳定,经济复兴有起色,穆塞韦尼的威望也在逐步提高,乌干达人民的大多数是支持穆政府的,并寄予厚望。”<sup>[9] (P62)</sup>当然,由于乌干达的民族成分复杂等原因,穆塞韦尼在国内没有达到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的那么高的威望。

在具体运作方面,两人的政治领导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异。马哈蒂尔利用执政联盟国民阵线牢牢掌握大权,而且,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和立法权之上。甚至马哈蒂尔可以利用国会内的国民阵线的多数地位,频繁的修改宪法和其他法律,以有利于政府的政令畅通。穆塞韦尼创造了“运动制”的独特体制。“‘运动制’是穆塞韦尼针对乌干达国情实行的一种政治体制,其特点是全国抵抗运动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和实行‘无政党政治’……通过各级‘抵抗运动委员会’广泛组织群众的做法。”<sup>[3] (P36)</sup>“运动制”团结全国各族、各党派、各政治团体的做法作为一种过渡未尝是一个成功的实验,这种政体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投入到乌干达的现代化建设中去。然而,这种无党派的政治体制无疑也是遭到西方和国内反对势力的诟病。穆塞韦尼不得不在2002年开放了党禁,允许反对派的自由活动。全国抵抗运动能团结和拉拢下层的民众,执政的受欢迎度较高,短时间内,反对派通过选举上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两位领导人的执政基础也有相异特征,马哈蒂尔的治国之策更加借助于政党制度,依赖他控制的巫统,再通过巫统掌控执政联盟国民阵线。而穆塞韦尼的个人威权的表面色彩更加浓重些。在马来西亚国内,反对派的存在是一种常态,马哈蒂尔不得不纵横捭阖,与反对派以及执政联盟国民阵线的内部的各派系进行斗争与协调,以保证其政策的通行顺畅。马哈蒂尔属政治强人,执政时间长达22年,这主要靠其强势的权威,雷厉风行的风格,顽强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精神。更主要的是,马哈蒂尔的威望建立在他给马来西亚带来的繁荣与富强的基础之上,反过来,而正是以国

家的现代化发展的成功实绩又增强了他的权威。

穆塞韦尼在执政的合法性上明显比不上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马哈蒂尔。穆塞韦尼以人民利益维护者的身份,发动了对奥博特的游击战,最终穆塞韦尼通过革命的方式取代了奥博特。乌干达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后,人心思定,穆塞韦尼结束了内战,推翻了不得人心的奥博特政府,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符合历史潮流,然而,但从法理上讲,其夺取政权的方式,却是对当时政府的反叛。

乌干达的文化历史传统中,国家的政治风云充满了变数,特别是部族矛盾尖锐,积怨较深,一个稳定的独大的政党在乌干达的存在将是其长期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前提。但现实是,穆塞韦尼的执政团队全国抵抗运动却比马哈蒂尔的执政党巫统松散的多。客观上,乌干达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总统一人身系国家命运,这种类似于军事独裁式的政体,本身孕育着极大的风险,乌的政治稳定缺乏持续性。在穆塞韦尼1986的上台至今,已历时二十多年,依然还未看到穆塞韦尼提他的接班人。国际社会和乌干达人民至今没有见到“后穆塞韦尼”时代的端倪,以及穆塞韦尼后的继任者,是否继续能给乌干达这颗非洲明珠,带来依然强劲的发展势头。此种情况与其说是存在变量,还不如说是乌干达在未来的发展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性。

## 2 马哈蒂尔与穆塞韦尼的治国之策在经济方面的比较

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经济领域。对经济发展这个充满变量的领域,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总是力图“定制”出一个愿景,这具体地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全面设计。两位领袖在治国之策经济政策方面的共性:都有强烈的经济发展的意识,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更加强调国家政府在主场中的作用;经济发展有一套总体的计划与战略,在提供政治稳定的同时,以政治权威的方式指导经济的运行,以期出现与预料的蓝图相称的经济成就。

马哈蒂尔在执政初期,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深入地干预。他上台后,对前任拉扎克总理的“新经济政策”采取了重大地调整,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种族间的紧张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几年经济开始腾飞。在成绩面前,马哈蒂尔再次加大改革力度,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20年来的经验教训,从1991年起,政府实施新的“国家发展政策”,以实现均衡的发展。在这个时期,马哈蒂尔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政策,并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实施“国家发展政策”时,马哈蒂尔又高瞻远瞩,雄心勃勃,提出了宏伟的“2020构想”,力争使马来西亚经济更有竞争力、更有生气、更为强劲。

穆塞韦尼上台后,致力于部族和解,发展民族经济,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经济的发展都有长足的进展。乌干达坚持自力更生,争取外援的基本经济政策,力图独立自主建立完全自给的民族经济体系。国家的复兴初期侧重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农业的发展。穆塞韦尼政府对经济发展也

非常注重调控,政府对经营不利的国营企业关闭或是拍卖,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国营企业则给予扶持。乌实行混合经济,经济活动比较宽松自由,政府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私营经济发展较快,在国家经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穆塞韦尼的领导下,“乌干达的经济整体已逐步走上复苏和发展的道路,初步形成了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sup>[7](P195)</sup>

在差异方面,马哈蒂尔在治国之策上,国家对经济的主导比穆塞韦尼更加强势,在管理国家经济的原则上坚定性大于穆塞韦尼。而穆塞韦尼在管理国家的经济时,表现得比马哈蒂尔更为灵活。穆塞韦尼上台后,立即放弃了原先他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理想,转向了自由主义。因为乌干达的现代化起步较晚,穆塞韦尼能广泛吸取他国的经验与教训,探索更为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西方学者认为,穆塞韦尼糅合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者的优点,再融入其灵活的运作手法,正在探索一条适用于多部族、多元文化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道路。

乌干达的发展节奏比马来西亚整整慢了一拍。乌干达从独立后到1986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波折不断,在奥博特和阿明执政期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而马来西亚在长期的现代化过程中,所走过的路比较稳健。马哈蒂尔和穆塞韦尼都强调经济发展要“向东看”,他们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经验的做法是一样的,但内涵上却大有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马哈蒂尔就提出了“向东看”的战略,即向日本和韩国看齐,要求马来西亚人学习日本和韩国的工作态度、经营管理经验和工作方法。面临亚洲四小龙的激烈竞争,马哈蒂尔提出“向东看”是地缘与时代所迫,也是马哈蒂尔领导马来西亚奋起直追的体现。进入了21世纪,乌干达等非洲国家才提出了“向东看”政策,学习的则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成功经验,也注意从东南亚的发展模式中得到启示。

在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方面,马哈蒂尔与穆塞韦尼也有很大的区别。马哈蒂尔执政初期,非常注重引进外资,外资在马来西亚创造了一种虚假的繁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马来西亚的经济,痛定思痛,马哈蒂尔及时调整经济的发展战略,加强金融监管,更加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扶植本国企业,下大力气促进产业升级,终于在东南亚国家中第一个走出危机。而另一方面,这次危机又使马来西亚国家引导的治国之策更加显得强势。“国家加强了对各个经济的监督和干预,试图借助指令性手段促使经济走上恢复的轨道……在马来西亚,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导致在经济领域的政治关系和个人关系超越了市场力量……”<sup>[4](P278)</sup>而乌干达的经济要比马来西亚落后的多,穆塞韦尼在推行经济发展战略时,初期比较依赖本国的力量,自力更生,但近几年,穆塞韦尼大力引进外资和争取外援,经济发展出现了较严重的对外依赖性。“由于乌干达借助国际力量缓解外债负担,政府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遵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改革计划。截至2008年年底,乌干

达外债总额18.4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1.1%。”<sup>1</sup>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穆塞韦尼政府已将摆脱对外援的依赖等列为治国理政重中之重,对引进外资制定新的政策,并加大力度培育本国的工业。

### 3 马哈蒂尔和穆塞韦尼的社会政策比较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民族国家的整合。在这个方面,马哈蒂尔和穆塞韦尼的相同之处在于,两个人的历史使命都是力图振兴自己的国家,他们的执政理念都包涵民族主义的思想,都在力促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

马哈蒂尔成为总理之前,其民族主义思想比较激进和极端,他在《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中,赤裸裸地鼓吹要优先扶持马来族人,然后再考虑各族均衡发展。当选总理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晚期则注重国内各种族的共同繁荣,表现得相对温和了一些。20世纪90年代后,马哈蒂尔政府在实施新的“国家发展政策”时,努力改善种族关系,对华人政策又作了较大幅度调整,提倡马、华经济合作,以增进马、华商界往来与相互理解,调动华人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1991年后,政府在许多经济领域提倡不分种族的自由竞争,对华族经商的限制也逐渐地放松,同时还强调马来族应认真向华族学习,而不要过于依赖政府的扶植。

从民族整合的政策和实效看,马哈蒂尔领导下的马来西亚与穆塞韦尼领导下的乌干达有很大的差异。马来西亚种族构成比较单纯,“其中马来人61.5%,华人23.6%,印度人7.1%”,<sup>[8](P73)</sup>其余为一些少数民族的原住民。马来西亚的国民教育程度比乌干达高很多,国内市场的经济交流也比乌干达频繁,可以说马来西亚比乌干达的条件好得多,但是,现实是,较发达的马来西亚依然是存在严重的种族问题,马来族人的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华人与印度人的处境也没有实质性的转变。马来西亚在形成马来西亚国家认同和归属感的统一的大民族上仍然遥遥无期。“在马来西亚,社会整合的难题不是提高少数民族发展问题,而是主流民族根本无法从经济等方面同化少数民族,而是依靠政府强制性的措施来帮助主流民族赶上经济上更为发达的少数民族(指华族)。这种错位显然是马来西亚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sup>[4](P332)</sup>这样,马来西亚的整个社会仍然在内部孕育着不安定的因素。

相比之下,乌干达民族构成非常复杂,全国约有40个民族,按语言划分,全国有班图人、尼罗人、尼罗-闪米特人和苏丹人四大族群,每个族群由若干民族组成。历史上的民族矛盾重重,穆塞韦尼上台后,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在比马来西亚更为复杂的民族问题的条件下,穆塞韦尼却创造了比马来西亚相对和谐的民族关系。“穆塞韦尼上台首先将民族和解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之一,社会矛盾初步缓和,

<sup>1</sup> <http://js.sinosure.com.cn/jiangsu/fxxx/gbfbg/111337.jsp>.

出现了稳定的社会局面。”<sup>[7] (P212)</sup> 穆塞韦尼政府将不同部族的人们团结起来,注重培养统一的乌干达的民族意识,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实现了民族的和解,并将建立民族国家提上了议事日程。

### 三、对马哈蒂尔和穆塞韦尼治国之策的反思

马来西亚是亚洲一个富有活力的国家,特别是在马哈蒂尔执政时期,马来西亚经济的飞速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马哈蒂尔运用铁腕,实行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的治国之策;并以此为基础,在保证国家处于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国内多元种族间的均衡发展,努力促进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融和;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国家指导的发展计划,由政府推动经济,最终实现了国家的快速发展。乌干达近几年也成为非洲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乌干达的经济增长率在非洲一直是名列前茅,经济调整也取得相当的成功。2001年,穆塞韦尼还被联合国授予“防止艾滋病突出领导成就奖”。穆塞韦尼也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马哈蒂尔与穆塞韦尼采用国家引导发展的治国之策,一个是亚洲的典型,一个则是非洲的代表。在亚洲,马来西亚快速发展让世界看到了这只东南亚之虎的勃勃生机。在非洲,穆塞韦尼领导下的乌干达领先于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通过对亚洲的马来西亚和非洲的乌干达的治国之策的发展模式的实证比较,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中,特别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引导的发展模式,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当然,发展中国家采用这种治国之策还要注意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如:在经济领域,国家引导的发展,可能导致政府对经济的主导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是政府的计划、指令过多,反而会危害了市场经济的运行。

然而,是不是国家引导的发展模式存在局限就不采用这种模式呢?现实是,在发展中国家中,走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发展的道路,取得成功的国家,数目毕竟比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的模式的国家少之又少。马来西亚和乌干达等国经济发展的业绩,充分证明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马哈蒂尔和穆塞韦尼的治国之策,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美]阿图尔·科利,著,朱天飏,黄琪轩,刘骥,译.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 [2] 李文.东亚社会变革[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 [3] 陆庭恩,黄舍骄,陆苗耕.影响历史进程的非洲领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 [4] 陈晓律,王成,等.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5] 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 [6] 李社辅.乌干达迈出了由乱到治的第一步[J].西亚非洲,1990,(05).
- [7] 陈令霞,张静芬.东非三国:缔造民族国家的里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 [8] 吴士存,朱华友.五国经济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收稿日期 2011-02-17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卞克文(1972~),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广西工商职业学院公共部教师。上海,邮编:200234。广西南宁,邮编:530001。

###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获得学术荣誉情况

- 1992年、2000年、2004年,被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编委会评定为“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1997年,入选“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
- 1999年12月,被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认定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 1996年、1999年、2000年、2004年,入选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社会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评定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2002年,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评定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核心期刊”;
- 2003年1月,荣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 2003年7月,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编辑委员会、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评、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中心定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刊源”;
- 2001年、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选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 2004年12月,入选教育部首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人类学研究)”;
- 2006年7月,入选教育部第二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

(胡不飞)